

● 赵 晓 雷

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几种思路的比较分析

80年代的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中面临着两个主要的挑战：一是经济增长的均衡度较差，供求总量失衡，产业结构失调，导致经济起落幅度较大；二是经济活动的效益低下，较高的投资率只引致了产值的较快增长，而并未使国民收入得到相应的增长。这种情况使中国经济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保持持续的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以及经济效益的相应增长，但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低下，积累能力不足，加之经济效益太差，一定量的投入只能推动较少的产出增长。所以，要使90年代的中国国民经济顺利发展，使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得以实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经济增长与资金供给短缺、经济效益低下之间的矛盾，对此，理论界主要提出了以下思路。

思路之一：引进外资推动经济增长

在现实经济中，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投入要素及技术进步的函数。如假定技术进步既定，那么经济增长取决于上述三种投入要素。从我国的情况看，劳动力资源丰富，只要提高熟练劳动力在总劳动中的比重，劳动力供给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自然资源虽然相对贫乏，但只要能加快引进技术设备进行深度开发，以及通过贸易渠道获得，也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此，经济发展的关键还在于资金投入。我国资金投入量受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不能与其他投入要素相配合以实现更迅速而合理的增长。而弥补“资金缺口”的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引进外资。

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引进外资来支持理想的经济增长率方面比较系统和有影响的理论，是1966年钱纳里和斯特劳斯提出的“两缺口模式”^①。这一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扩大投资。扩大投资受到三个因素的约束：一是资本吸收能力；二是储蓄水平；三是外汇数量。如存在储蓄缺口，达不到所需投资水平；或存在外汇缺口，无法满足机器设备的进口需要，将无法实现理想的增长率。解决的办法就是引入外资以弥补两缺口。

“两缺口模式”强调了利用国外资源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一、利用外资可以增加出口能力，从而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二、利用外资可以提高投资率，通过投资乘数作用加速经济增长。

但是，上述分析只是理论抽象。在现实经济中，假设外资流入没有障碍，引进外资要考虑三个问题：一是外债规模；二是外债投资效益；三是外债结构。

（一）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与适度外债规模 国际上考察一个国家外债规模主要有三个指标：一是负债率（ $\text{负债率} = \text{负债总额} / \text{国民生产总值}$ ）；二是债务率或借债率（ $\text{债务率} = \text{外债余额} / \text{出口、劳务收汇额}$ ）；三是偿债率（ $\text{偿债率} = \text{还本付息额} / \text{出口、劳务收汇额}$ ）。一般认为，负债率在20%左右为宜，债务率在100—150%左右为宜，偿债率为20%左右为

宜。在这些指标数值内，可算外债规模适度、安全；若超出了这些数值，就是超过了警戒线，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我国在1985年以前，负债率一直低于6%，1988年为9%，而发展中国家1986年的平均负债率为35.4%。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1990年我国外债余额525.5亿美元，债务率为89.3%，偿债率为8.5%。●以上三个数值均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说明我国引进外资规模尚不算大。

然而，上述数字指标只是一种参考数值，并不绝对地确定一国的外债规模。如果外债使用效率、出口换汇能力、国内资本配套能力等较高，则偿债率、负债率也就可以相对提高，南朝鲜的偿债率高于25%，却没有发生还债困难。如这些能力较低，那么负债率、债务率和偿债率也就不宜提高。从理论上说，适度外债规模可定义为外资边际收益等于外资边际成本时的外资流入量。如假设外资边际成本既定（从短期看，一国外资流入量的变化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利率变动不会产生大的影响），那么，适度外债规模就决定于外债边际收益的大小。外债边际收益越大，偿债能力越大，偿债率越低，负债率就可以越高，外资流入规模也就可以越大。外债边际收益的大小一般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外债投资效率；二是债务国的配合性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外债投资效率在下面分析。外债流入的配合性生产要素，是指国内资金配套、劳动力素质、外汇管理能力、信息传播能力、经济体制效率以及一些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它们的供给状况亦决定外债边际收益的大小。仅从资金配套看，我国现在借1美元的国外贷款约需5元人民币的配套资金。“七五”期间我国借用国外贷款相当于同期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10%，国内配套资金已感紧张，有的项目因配套资金不足影响了工程建设进度。其他配合性生产要素如高素质的劳动力、管理及基础设施等在我国亦是供给短缺，且在短期内无法改变。所以，配合性生产要素供给短缺使得外债边际收益较早开始递减，因而成为外债规模扩大的一个制约因素。

（二）外债投资效率与外债规模 在1979—1990年的11年中，我国共利用外债500多亿美元，建设了一批规模巨大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推动了上万个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增加了许多短缺产品的供给，提高了产品的品质和档次，替代了一部分进口，扩大了出口，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如果从外债的投入—产出比来看，情况尚不容乐观。据统计，我国1985年的情况是，大约每增加30亿美元的外债，可使国民收入增长1%。按此投入—产出比推算，我国在80年代依靠外债所增加的国民收入是3.3%，平均每年仅为0.33%。有些发展中国家采取依靠外债的战略发展本国经济，取得了成功。但我国人口众多，且国内生产能力、技术水平、总体经济效益都比较落后，靠大规模引进外资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有不少困难。

（三）外债构成与外债规模 我国外债的构成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外国政府、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包括在境外发行债券）；二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三是通过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从国外引进各种设备和生产资料，这部分外资将以企业产品出口或工缴费偿还。在这三部分外资构成中，第一、二部分是主要的。1988年6月底，我国的外债余额为350亿美元，其中由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长期低息贷款共约100亿美元，通过外商投资吸收的外资共约121亿美元。^③

外商直接投资是利用外资的一种有效手段。其主要优点是债务国与外商利益均沾，能刺激外商关心投资效益，以提高生产能力和增加收入。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在投资方向上不易控制。从我国的外资投资结构看，中长期贷款基本上投资于农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教

育科学等领域,使用基本合理。然而,外商直接投资在相当长时期内则是集中在消费品生产如化妆、食品加工、轻纺等部门以及宾馆、饭店等第三产业部门。根据国际经验,外资投向基础产业部门有助于债务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及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但如果债务国不能有效控制外资投向,那么外商直接投资份额的加大将会与其产业政策发生矛盾,不利于债务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以上分析是从外商直接投资方向方面对外债规模规定的限制。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及国际商业贷款也是我国引进外资的主要渠道。从我国的情况看,外债构成中商业贷款的比重较高,1985年占50%,1991年已占外债余额的60%左右,超过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中商业贷款占50%的平均水平。商业贷款的利率高,又是浮动利率,易受国际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且还款期较短,一般为5年左右,最长不超过10年,因此贷款的成本比较高,风险亦较大。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问题主要出在商业贷款上。因此,我国的国际商业贷款也不宜大规模增加了。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一般期限较长、利率较低,因此是引进外资的较好渠道。但这些贷款在投资方向上有一定的限制性要求,而且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较大,因此在引进规模上也不容易保证。以上分析是从国际贷款来源方面对外债规模规定的限制。

总之,引进外债以弥补一部分国内资金缺口,促进经济增长,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政策,应当长期坚持执行。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情,引进外债规模受种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因此不能依靠大规模引进外债来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思路之二:依靠国内高积累推动经济增长

理论界对于我国的积累率和投资规模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我国80年代投资规模处于恶性膨胀之中,由投资膨胀及经济过热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生活的混乱;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我国现实的积累率并不高,投资不是膨胀,而是严重不足,以至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这种意见认为,如果没有能力通过提高经济效益以降低国民收入增长对新投资的需求,就只能靠增加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这种意见还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迟发展效应”的阻碍,即使在最佳增长假设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会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对经济高速增长具有更大的紧迫感。

高积累、高投入思路的一个主要理论假设是“投资乘数”^⑤原理。通过运用投资乘数原理对投资与国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分析,他们得出如下认识:

(1)当边际消费倾向为一定值($0 < CY < 1$)时,国民收入绝对量将依据于消费倾向以投资增量的倍数关系增长。

(2)在既定的社会生产技术水平 and 投资效益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的增长。

(3)当年投资增长绝对量保持不变时,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

高积累、高投入思路的另一个主要理论假设是我国目前的积累率是高估的。如将日本的“投资率”调整为可比口径的我国的积累率,日本1956—1970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平均积累率高达40.3%,而我国同期的年平均积累率仅为26.8%;1952—1976年日本年平均积累率为36.8%,高于我国同期的27.2%。被普遍认为偏高的我国80年代的积累率与日本相比也是偏低的。这一思路认为,积累水平的高低表明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在保证

人民消费水平随经济增长而逐年有所提高的前提下，积累水平尽可能高一些，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

高积累、高投入思路在关于投资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分析上还是有见地的。对于尚处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一定水平的积累率 and 投资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世界银行以80个发展中国家的抽样调查为依据，全面说明了1965—1987年期间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是与其高储蓄率相对应的，而取得经济低增长率的发展中国家则是与其低储蓄率相对应的。^①

至于积累率高估问题，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统计口径问题。但是，积累率无论如何统计，它总是与消费率相对应而言的，积累率的提高就意味着消费率的下降。因此，从社会的角度看，积累率的极限是公众可以接受的“社会贴现率”（社会贴现率指社会对不同时期的净收益和消费所赋予的不同重要性。公众可以接受的社会贴现率指公众为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未来更多的收入及消费所愿意做出的最大的现时消费牺牲）。如果超出了这一极限，公众的正常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或公众的现时消费水平趋于下降，就会抑制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并会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影响经济的增长。从我国的情况看，一方面应当科学地确定一个适宜的积累率，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有所提高的前提下使积累规模达到最高水平。但是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人均收入低下，生活水平不高，这些因素从根本上限制了积累规模的大幅度增长，即使达到了较高的积累率，积累总量及人均积累额也不会有大的提高。因此，高积累、高投入的路子似乎难以走通。

思路之三：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

分析表明，通过引进外援的办法，通过提高积累率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供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因此，理论界较多意见认为，为推动经济更快增长，比较合理的办法还是根据我国人均资源少、人均收入低、资金短缺、效益低下的国情国力，努力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在投资一定的前提下取得最大的产出效益，使有限的资金支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及内涵是技术进步，因此，这一思路在理论上便涉及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考察，把技术进步定义为生产函数曲线的上移，即在生产要素投入量的一定组合下，能使产出量增大的技术革新称之为技术进步。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从长远的角度看，不是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决定因素。索洛模型启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诸因素的综合分析，不少经济学家研究和量度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的大小，以探求各种条件下经济增长的途径。这些实证分析从不同角度验证了索洛关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的理论。

80年代以来，我国总体经济发展战略贯穿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将经济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在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上基本上都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应该说，这种战略设计是符合经济增长客观规律、也是适应我国经济成长阶段的特点和要求的。但是，从80年代的情况看，我国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具体实施上有不少障碍，以至现实经济与发展战略的方针和要求不尽相符。比如，经济发展战略一再强调要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使经济转入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效益型发展轨道。而80年代以

来,中国经济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存在着高投入、低产出,高成本、低效益的粗放经营状况,一些主要宏观经济效益指标甚至呈下降趋势。又如,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一再强调国民经济发展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并制定了相应的产业政策。而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失衡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结构失调导致“瓶颈”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趋严重。产生这些矛盾和困难的深层原因主要不在于指导思想,而在于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战略不适应、不配套。这种情况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第一,国民收入分散化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并引起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总量失控、投资结构失调。

80年代以来,我国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过分地向个人倾斜,在国家财政收入中过分地向地方倾斜,造成财力物力分散。1984—1988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9.5%,而职工工资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9.7%,1983—1988年,社会集团购买力平均每年增长20.6%。同时,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由1979年的31.9%下降到1989年的18.8%;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由1981年的57.6%下降到1989年的45.2%。^③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分散导致了投资的分散。统计表明,1985年的投资膨胀基本上不属于“国家行为”。在1985年全社会完成的274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中,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仅900多亿元,只占1/3略强。而由地方、企业用预算外资金安排和集体个人进行的投资则占近2/3;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完成的1652亿元投资中,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也只占50%强。^④1990年,国家直接掌握的预算内投资仅350亿元,国家能够控制的也不过800亿元,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000多亿元的20%。^⑤

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决策分散化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调的矛盾。一方面,各地区、各部门受局部利益的驱使,兴办各种价高利大的加工工业,追求完整的加工工业体系。地区加工工业趋同化既造成基础工业发展更形滞后,又使加工工业形不成规模经济,而且大量生产能力闲置,造成巨大浪费。另一方面,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由于国家掌握的资金和资源递减,因而无法满足战略重点产业发展的需要。国民收入分散化也使国家财力减少,使国家缺乏相应的经济力量和经济手段调控社会经济运行,导致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失效,降低了全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效益,也降低了社会积累能力。

第二,公有制前提下国营企业产权关系和经营机制尚未理顺和健全,致使国营企业活力不足、约束软化、效益不高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

1991年9月,李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国营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现有独立核算的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1万多个,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2.5%,但创造的工业产值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5.6%,上缴国家的利税占60%以上。因此,提高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效益,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增强企业活力和提高企业效益,就是要使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能力。^⑥从我国的情况看,国营企业活力和效益的提高是社会效益提高的根本保证和具体体现。如果企业改革不取得实质性进展,企业没有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一方面使得市场体系难以形成和完善,另一方面也使国家无法用规范的经济手段来管理企业,从而造成社会经济运行的无序和低效益。

以上分析表明,要真正将我国经济导入效益型增长轨道,不仅要制定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软件”,而且要建立健全的、有效率的经济管理和运行体制这一“硬件”,才能使

经济健康、顺利发展。对此，本文提出两点粗略的思考。

1. 在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上，应该根据特定经济成长阶段的生产力发展规律，选择适宜的经济管理形式和手段。世界经济史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要经历一个国家干预强化阶段。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必须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的高速增长客观上需要积累和投资的相应增长，需要集中使用现有生产力。因此，国家一方面必须直接掌握和统一调度大部分社会积累以保证资金、资源的集中使用和有效配置，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对经济的计划管理以控制国民经济总量规模及增长速度，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总之，现在应该加强计划调节的力度，以便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及社会总体利益出发，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地有效地分配社会劳动，并且通过计划安排使各种利益追求和经济行为联结为一个整体能量，推动经济的更快发展。

2. 在微观运行机制的改革上，应该根据我国国家所有制的产权关系特点，在劳动者的经济利益与现有产权关系相联系的基础上生成一种激励和制约机制，根本解决经济的活力和效益问题。现阶段要理顺我国的经济利益关系，应循着劳动力商品化的思路，用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规则界定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以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数量和产出效率作为劳动收入分配的客观尺度，硬化职工工资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的联系，使积极的劳动行为得到激励，消极的劳动行为得到制约，以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及总体经济效益，推动经济更快增长。

(1)：

①参阅代纳里、斯肯诺斯：《外溢与经济发展》，《美国经济评论》1966年8月41。

②《经济日报》1991年9月3日。

③《1989中国经济年鉴》，II—48页。

④《学习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辅导材料》，第241页。

⑤“乘数”概念是英国经济学家卡恩(R·F·Kahn)于1931年首先提出。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引进了这一概念并提出了“投资乘数”原理。

⑥郭树清等《我国近些年的积累水平问题》，《经济研究》1990年第一期。

⑦参阅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6页。

⑧⑩《1989中国经济年鉴》，《学习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辅导材料》，第37页，第212页。

⑨《1986中国经济年鉴》，II—10页。

⑪《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1日。

“加速转换国营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加大改革份量，加快改革步伐”的精神，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中国社科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日报》上海记者站、上海纺织品公司、上海贸易与发展研究会最近在我校联合召开“加速转换国营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研讨会。在会上，举行了上海财经大学聘任中国社科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所长、《财贸经济》杂志社主编、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研究员为兼职教授的仪式。由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汤云为教授向张卓元所长颁发了聘书。然后，张卓元所长作了关于学习邓小平近期谈话精神的报告。

(一丁)